

落地成家：桃園大湳 自力眷村臺生二代的家庭敘事

李廣均*、林昀薇**

摘要

本文嘗試指出，大陸來臺軍人的陸續「增加/浮現」是民國60-70年代桃園縣八德鄉人口數量快速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力眷村則是他們的主要群聚類型。本文以一位於桃園縣八德鄉（市）大湳地區成長之自力眷村臺生二代孫永萍的家庭故事為主軸，探討大陸來臺軍人自發性群聚類型的生活日常、生命歷程、婚姻、家庭、親子關係、職業工作、落地成家、建屋置產、鄰里生活與族群關係等面向。我們認為除了列管眷村之外，自力眷村也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群聚類型，他們的出現、轉型或是消失，是我們瞭解民國38年（1949）來臺移民落地成家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面向。

關鍵字：大陸來臺軍人、落地成家、八德鄉、自力眷村、列管眷村

*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專任教授

**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

一、前言

民國38年（1949）前後從大陸來臺的軍民，居住臺灣的時間已經超過70年，臺生第三代或第四代也已長大成人，落地成家更是不可逆轉的家族開展過程。然而，相較目前對於清領或日治時期的探查，國府遷臺後的歷史研究多半聚焦兩岸對立、軍事衝突或國際關係等，也多以上層政軍菁英為主要對象，此波來臺軍民的庶民經驗仍有許多尚待補白的知識空隙。本文關注來臺軍民落地經驗的特殊與多樣性，希望可以對照列管眷村的既有觀察，看到不同群聚類型的可能、相似與差異，提供一塊1949來臺移民的社會拼圖，補上本土化的知識缺口。

本文以一位於桃園縣八德鄉（市）大湳地區成長之自力眷村臺生二代孫永萍的家庭故事為主軸，探討大陸來臺軍人自發性群聚類型的生活日常與生命歷程，主要關心他們的婚姻家庭與親子關係、職業工作與經濟行為、落地成家與建屋置產、鄰里生活與族群關係等面向。¹我們認為除了列管眷村之外，自力眷村也是一種值得關注的群聚類型，他們的出現、轉型或是消失，是我們瞭解民國38年（1949）來臺移民落地成家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面向。

民國55年（1966），孫永萍出生於桃園縣復興鄉，曾經跟隨父親部隊四處移防，4歲時搬到桃園縣八德鄉大湳地區，剛開始全家租房子住，就在現今和平路旁軍營附近（圖1）。當地居民指出，和平路南北兩側均有軍事營區，北側目前是國軍六軍團53工兵群營區，南側過了重慶街之後則是保一總隊營區，早期也是軍事營區，目前已改建為大湳森林公園。

孫永萍的父親孫存義，祖籍湖南安仁，生於民國13年（1924），卒於民國101年（2012），享年88歲。19歲那年（民國32年，1943），日軍占領湖南老家附近地區，民衆遭受迫害苦不堪言（缺乏糧食），孫存義試圖逃跑三次，前兩次均被日軍抓回，最後一次成功脫逃，並加入國民黨部隊。戰爭在孫存義額頭上留下一道深刻的疤痕，印記清晰可見，他日後隨部隊輾轉來

1 為保護受訪者及家人隱私，本文使用的人物指稱均為化名。正式訪談於民國110年（2021）4-7月間進行，總計進行1次家庭面訪（約2小時）和1次電話訪問（約1小時），並多次透過社群軟體補充提問、交換訊息。受訪者是一位自雇的珠寶業者，已婚、育有一女，與本文作者之一的家人是有業務往來的客戶，也是朋友關係，具信任基礎。感謝審查委員針對以上資訊提供的修改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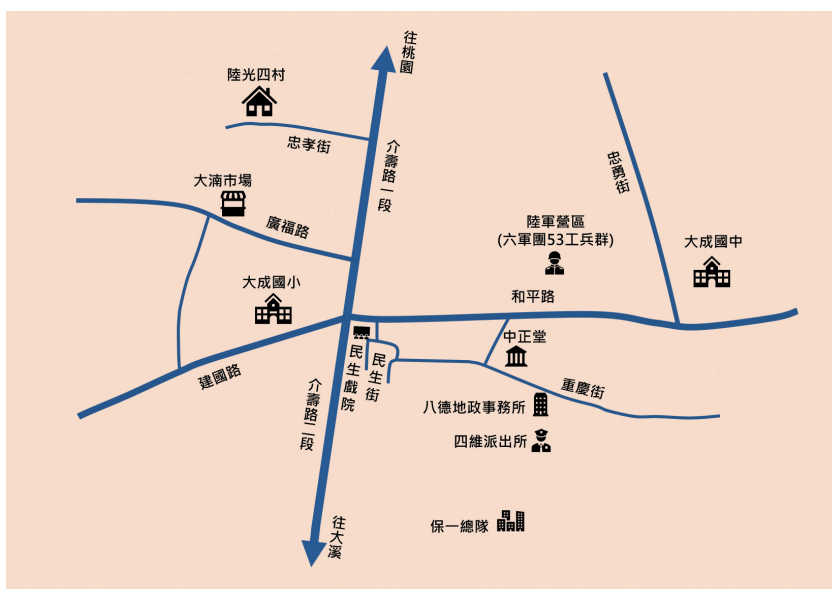


圖1：八德大湳地區生活示意圖。

資料來源：李廣均繪。

到臺灣。之後，孫存義隨部隊四處駐紮，曾經待過金門、關渡、桃園等地，於民國60年（1971）在桃園縣八德鄉大湳地區退伍，離營官階是陸軍二等士官長，享終身俸。

八德鄉位於桃園縣東側，面積約33.71平方公里，是桃園縣最小的行政區，東西長約6.76公里、南北長約8.46公里，地勢南高北低，茄苳溪流經其中。八德鄉北鄰桃園市，是桃園政經發展的重要腹地，東靠臺北縣鶯歌鎮、西接中壢市與平鎮鄉、南往大溪鎮，是臺北縣與桃園縣境內重要交通樞紐。近年，八德工商業發展興盛，每平方公里工廠數量超過30家，工廠密度居全桃園之冠。²

八德鄉於日治時期屬於新竹州桃園郡，民國34年（1945）改為新竹縣桃園區八塊鄉，民國35年（1946）改為八德鄉，民國39年（1950）改隸桃園縣八德鄉。八德鄉早期以農業為主，但由於水源不足，雖然農地廣大，卻多旱地及泥濘地，農業發展困難。民國60、70年代以來，八德鄉工商經濟

2 張育端、莊翰華、曾宇良，〈非都市丁種建築用地更新之研究：以桃園縣八德市為例〉，《土地問題研究季刊》，期47（2013年9月），頁8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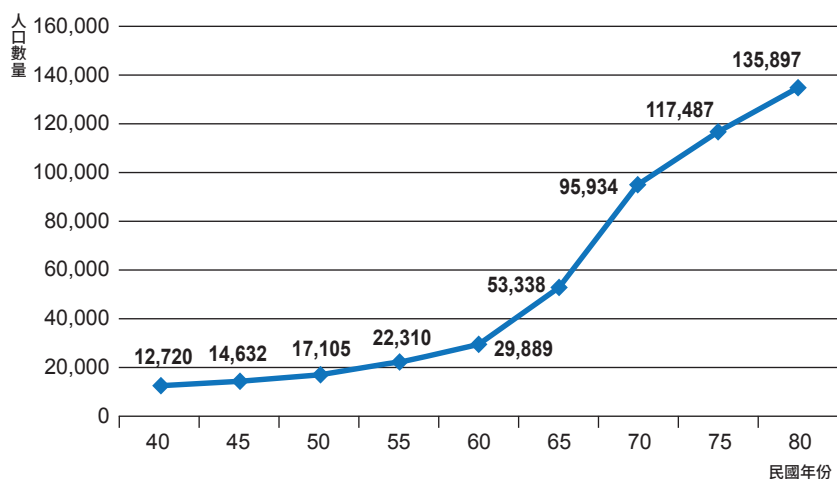


圖2：八德鄉（市）歷年人口成長趨勢：民國40-80年（1951-1991）。

資料來源：李廣均，〈初探桃園縣的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1950-1990）〉，《桃園文獻》，期6，頁77。

發展快速，人口迅速成長，民國84年（1995）元月1日跨過升格門檻（15萬人），繼桃園市、中壢市、平鎮市之後成為桃園縣第4個縣轄市，進入都市發展新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德鄉都市發展與人口成長的過程之中，大陸來臺軍民扮演了什麼角色？

二、桃園縣八德鄉的大陸來臺軍民

民國40年（1951）八德鄉人口只有12,720人，民國50年（1961）17,105人，民國60年（1971）29,889人，人口成長緩慢，是一個典型的農村社會。³到了民國70年（1981），八德鄉人口數量迅速成長至95,934人，成長幅度超過三倍，民國80年（1991）更是增加至135,897人。八德鄉（市）歷年人口成長趨勢可見（圖2）。回顧來看，民國60-70年（1971-1981）可說是八德鄉人口成長最快速的時期。然而，除了經濟熱絡吸引各地城鄉移民的湧入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值得注意？

本文認為，民國38年（1949）大陸來臺軍民落腳八德地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透過歷年4次（1956、1966、1980、1990）臺閩地區戶

3 李廣均，〈初探桃園縣的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1950-1990）〉，《桃園文獻》，期6（2018年9月），頁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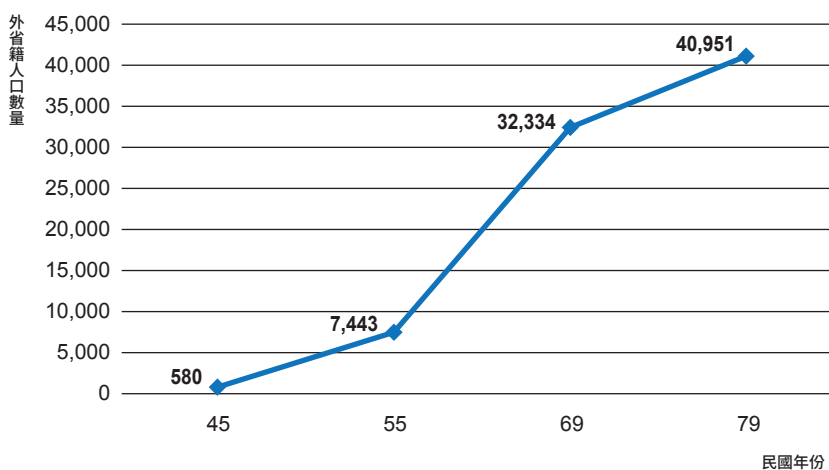


圖3：八德鄉（市）歷年外省籍人口成長趨勢：民國45-79年（1956-1990）。

資料來源：李廣均，〈臺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期57（2015年9月），頁146-147。
1956、1966、1980、1990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

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我們可以看出八德鄉外省籍人口的增加趨勢，見（圖3）。民國45年（1956），八德鄉外省籍人口只有580人，民國55年（1966）增加至7,443人，增加明顯（約13倍），但數量相對有限。民國69年（1980），八德鄉外省籍人口快速增加至32,334人，成長超過4倍（增加近25,000人），民國79年（1990）則是進一步上升至40,951人。由此可見，民國55-69年（1966-1980）是八德鄉外省籍人口增加速度最快的一段期間。就全桃園縣而言，民國79年（1990）八德鄉外省籍人口數量是全縣第二高，僅次於中壢市（67,554），但就比例而言，外省籍占八德鄉人口的29.93%，則是全縣最高，⁴也是全臺外省籍人口比例第八高的行政區，我們該如何解釋此一現象？⁵

4 李廣均，〈初探桃園縣的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1950-1990）〉，《桃園文獻》，期6，頁85。

5 李廣均，〈臺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期57（2015年9月），頁146-147。民國79年（1990），全臺外省（市）籍人口比例最高的前10個行政區（人數／比例）依序分別是臺北縣新店市（83,702／37.29%）、臺北市大安區（128,260／35.08%）、臺北縣永和市（80,138／34.71%）、臺北市文山區（80,206／34.58%）、高雄市左營區（44,868／34.55%）、臺北市中正區（61,367／31.79%）、臺北市信義區（74,199／30.88%）、桃園縣八德鄉（40,477／29.93%）、基隆市信義區（12,572／29.73%）、臺北縣中和市（106,820／28.93%）。

對此，既有文獻對於八德鄉外省籍人口的增加並沒有太多解釋。雖然《八德市志》曾經在編後語中提及「八德地區由早期的平埔族、閩粵籍的墾者和光復後外省人至此地落腳等，構成了八德整個住民的面貌」，但沒有特別提及外省籍人口的增加原因，只有簡述陸光四村建村和榮民之家成立。⁶然而民國56年（1967）建村的陸光四村只有5百餘戶，民國63年（1974）成立的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內住安養榮民只有2千5百餘位，八德鄉只有4個列管眷村（約928戶），這足以解釋前述八德地區外省籍人口在民國55-69年（1966-1980）的快速增加嗎？

本文希望指出1960年代以來，大陸來臺軍人陸續退役離營或是結婚成家是一個重要原因。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如何安置數量龐大的來臺軍人是統治者的沉重負擔。一方面，美國雖然願意提供各項軍經援助，卻也擔心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會破壞臺海平衡，因此要求國府進行裁軍整編，許多「老弱殘疾」被迫必須離開軍隊；另一方面，當初許多人是被迫從軍，來臺之後對軍中待遇、發展機會都難以接受，許多自覺「年輕力壯」者也選擇提早退伍；⁷再則，隨著民國47年（1958）八二三砲戰的開打與緩解，兩岸對立緊張局勢漸趨穩定，許多來臺軍人開始有了退役離營，或是結婚成家的想法與行動（另一重要原因是民國48年禁婚令逐步解除）。但是這些陸續離營或結婚的來臺軍人會住在哪裡呢？

在經濟窘困又沒有親族接應的情形之下，當初因為戰亂倉促來臺的大陸軍民多半必須相互扶持共生取暖，群聚現象應運而生。比較來看，全臺各地歷年來約有十幾萬名（含遷入遷出）具有婚姻身分的在役軍人，陸續申請入住列管眷村，其他提早退役、在役未婚或是晚婚而未獲配住列管眷舍的軍人，必須自行解決居住問題。這是因為國防部相關資料⁸指出，各地列管眷村約886處，共計約10萬8千餘戶，無法滿足大多數來臺軍人及其眷屬的居住需求，各地因此出現「自力眷村」的群聚現象。⁹

6 黃克仁編，《八德市志》（桃園：八德市公所，1998），頁73、218-219、403。

7 胡台麗，〈從沙場到街頭：老兵自救運動概述〉，收錄於徐正光、宋文里合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1989），頁165。

8 郭冠麟，《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的故事：國軍眷村發展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頁1、387-434。

9 李廣均，〈臺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期57，頁129-172。

「自力眷村」是指稱存在於各級政府（如國防部、退輔會、省市政府）提供的住宅體制之外，以第一代大陸來臺軍人及其眷屬爲主的自發性群居聚落，取其「自力救濟」之意。他們規模不一、人口組成多樣，有些出現在列管眷村內外或軍事營區周邊（村營周邊型），有些則是以違章建築形式存在於都市空地，夾雜部分私人擁有的合法建物（都市空地型），住戶除了包括未獲配住列管眷舍的來臺軍人及其眷屬，也可能包括許多單身獨居的同鄉、同袍，以及來自全臺各地的本省籍城鄉移民。

這也就不奇怪，歷年來列管眷戶人數占全臺外省（市）籍人口的比例約在14-25%之間。¹⁰以民國60年（1971）爲例，當時全臺人口共計14,994,823人，其中外省（市）籍人口是2,388,611人，那有多少人住在列管眷村呢？參考民國60年（1971）的平均戶量（5.55人），我們可以推估列管眷戶人數約有477,272人，占當時全臺外省籍人口的19.98%。換言之，當時全臺各地沒有住在列管眷村的外省人總計有1,911,339人，占當時全部外省籍人口的80%。亦即平均每10個外省籍人口之中，約只有2人住在列管眷村，其他多數外省籍人口並沒有住在列管眷村，此一觀察也適用於其他時間的討論。

若以桃園縣來看，縣內「外省籍人口」（民國39-79年）多數並不住在列管眷村，住在列管眷村的外省籍人口反而是相對少數。¹¹民國55年（1966）桃園縣已有65處列管眷村，此一數字至民國79年（1990）僅微幅增加至85處，列管眷戶家庭人數則是從4萬5千餘人增加至5萬5千餘人，但同一時間外省籍人口則是從11萬8千餘人激增至25萬6千餘人，增幅超過2倍，這些外省籍人口或大陸來臺軍民從何而來？

必須說明的是，國民政府遷臺初期採取軍籍與戶籍並行的二元人口管理體制，數十萬大陸來臺軍人只有軍籍（軍人身分補給證）沒有戶籍（國民身分證）。根據當時《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大陸來臺軍人若因爲離營退役、結婚成家或是有居住營外之必要者，必須向所在地戶政機構申報戶口，從軍籍轉爲戶籍。因此正確地說，早年來臺軍人取得戶籍並不是一種人口統計

10 李廣均，〈臺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期57，頁141-143。

11 李廣均，〈初探桃園縣的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1950-1990）〉，《桃園文獻》，期6，頁71-99。

上的「增加」或「移入」，而是應該被視為原先軍事管制體系下隱藏人口的「浮現」。¹²

民國58年（1969），軍籍與戶籍並行的二元人口管理體制走向終點，行政院修訂《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各地軍事營區設立國防共同事業戶，舉凡在臺無眷的在役軍人均發給國民身分證並設立戶籍，軍籍與戶籍正式合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人口管理辦法實施之前或之後，每年應會有為數不少的來臺軍人因退役或結婚而取得戶籍，在全臺各地「增加/浮現」了不少外省籍人口，桃園縣的幾個行政區（例如中壢、平鎮、龜山、八德等）即為一例，主要因為桃園縣內設有許多以陸軍為主的軍事院校、單位和營區。我們可以如此推論，受限列管眷村數量不足，這些後來因為各種原因（結婚成家、離營退役、有居住營外必要者）而陸續「增加/浮現」的大陸來臺軍人，會以自力眷村的型態出現群聚現象，這是我們探究孫永萍家庭故事之前，必須掌握的一個基本認識。

上述討論衍生出一個值得深入關注的問題，自力眷村的生活日常有何特殊之處，與列管眷村又有何不同？自力眷村的住戶如何落地成家，如何開展婚姻與家庭生活？在缺乏在地親族的支援之下，他們如何解決物質與經濟問題，又會發展出什麼樣的置產經驗？面對相對流動開放的生活場域，鄰里互動有何特殊之處？對此，本文主要訪談1位於桃園縣八德鄉大湳地區成長的臺生二代孫永萍，透過她的回憶與轉述，期能一探自力眷村的生活樣貌。

三、婚姻家庭與親子關係

民國55年（1966）在同袍介紹之下，孫存義付了2萬5千元的聘金，娶了一位桃園縣復興鄉泰雅族女子為妻。結婚時孫存義42歲，妻子15歲，這是那個年代外省先生與本省太太之間典型的老夫少妻組合，兩人相差27歲，遠超過相關研究發現的光復後省籍通婚平均年齡差距（外省先生與閩南妻子相差12.76歲／外省先生與客家妻子相差16.92歲）。¹³對於這樣的婚姻組合，孫永萍表示：

12 林勝偉，〈政治算術：戰後臺灣的國家統治與人口管理〉，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2005，頁51-62。

13 王甫昌，〈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期76（1994年4月），頁63。

介紹啦，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那個老兵啊他們比較，因為老兵來臺灣都比較沒什麼錢，都是那種同袍會介紹，然後娶就娶原住民。那個時候我媽15歲吧，好像是付聘金，那個時候早期他們婚姻都用應該算買賣，好像是2萬5吧！……那個時候原住民就認為說軍人最大嘛，他們就認為說嫁給軍人最好，軍人有槍最大，嫁給軍人最有保障，因為他們可以領固定薪水，一些老百姓根本沒錢。

結婚那年，孫存義和妻子生下了第一胎，但因為孫存義平日必須待在部隊，妻子懷孕之後只好回到山上部落待產。後來因為媽媽早產，孫永萍出生時才6個月大，山上的產婆是用手把她從媽媽產道中抓出來，身體大概只和老鼠一般大小。由於當時山上醫療條件不佳，沒有醫院也沒有保溫箱，原本想說可能養不活，因此孫永萍從小腸胃就一直不好。由於早年孫存義經常必須隨部隊移防，孫永萍小時候就和媽媽在平地 and 部落之間輪流居住，後來媽媽又陸續生下了一個弟弟（排行老二）和三個妹妹，但是後來弟弟一出生在醫院就夭折（原因不可考），因此家中共有4個姊妹。

談到小時候的家庭生活，孫永萍無奈地表示，爸爸是軍人，脾氣較為暴躁，甚至會對媽媽施予暴力，導致媽媽在她國小一年級時就離家出走。¹⁴媽媽離開之後，主要是由孫存義負責照顧4個女兒的生活起居，不過媽媽偶而會偷偷跑回來看她和妹妹們，母女之間經常保持聯絡。在那個年代，來臺軍人與年輕妻子之間的生活衝突與婚姻問題並不少見，老夫少妻年齡差距產生的各種磨擦或是社會問題經常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¹⁵民國48年（1959）才逐步放寬的禁婚令，更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結構性原因。¹⁶

孫永萍記得自己早上5點就要起床洗全家的衣服，放學回家後則是要背著妹妹做飯，當時家中最小的妹妹才剛學會走路。她說，自己很小就會做菜，爸爸會教她如何洗米、煮飯、顧鍋。相較於一般列管眷村之中經常出現「爸爸不在家」的場景，孫永萍的成長記憶則是「媽媽不在家」，她因此必

14 受訪者表示，孫存義的夫妻關係到了晚年出現重要轉折。約在民國89年（2000）之後，離家多年的妻子回到了家中，照顧孫存義的身體狀況和日常生活，孫存義臨終之前也曾向妻子表達歉意和謝意。雖然孫氏夫妻的相處之道並不是本文主要寫作主旨，但上述訊息的提供應可幫助我們更全面的認識自力眷村之中來臺軍人婚姻關係的全貌。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提供的修改建議。

15 王慧瑛、黃瑞典，〈妻外遇生子老榮民優雅復仇〉，《聯合報》，2008年7月18日，版6。

16 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提供的修改建議。

須姊代母職，照顧3個妹妹的生活起居。

談到爸爸對於家中小孩的教養方式，國三就轉學到臺北讀書，和媽媽、阿姨們一起租房子住的孫永萍有著非常矛盾的感受。一方面，她表示：

我們都很小就離開家裡，因為就很想離開家裡啊，在那個環境啊，因為我爸爸很嚴厲，小時候打很兇，吊起來打，因為軍人就都是這樣。……自己鬼混去啦，我們就自己在社會上磨練。要讀書我爸就會給你錢，一個禮拜5百，可是根本沒辦法，坐車回來就不夠了。我妹有一次就保送體專，她本來要出國比賽我爸就覺得說幹嘛要出那個錢，所以那個生活壓力沒辦法，所以我們都很早就出來賺錢。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我們在外面租房子在臺北租房子也要開銷，他不知道要花那麼多錢。他就覺得一個禮拜5百塊，在外面吃住讀書。反正我們也不愛讀書，年輕時候就不愛讀書。我們家每個小孩都非常聰明，但就沒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環境培養你，不過我們都離開家嘛，年紀比較大後之後都自己自學。我大妹後來進證券公司，她進證券公司因為學歷不夠，然後她就邊上班一邊假日去修空大，然後很快就把它修完了，她現在已經是高階主管。老三之前也是小混混一個，之後也是覺得書讀得不夠多，就去讀空大，第一名畢業這樣。

另一方面，她認為以前無法體會父親的愛，長大之後才發現父親的用心：

我們小時候覺得他很暴躁很怕他，但長大之後你就會知道他的關心和別人不一樣。我爸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離開家裡是沒有讀書的。他很小的時候媽媽就死了，爸爸都在賭博，所以他小時候沒有讀書。他是自己在部隊晚上學字，所以學得一手好字。他是一個很認真嚴厲的人，非常非常嚴厲的一個人。……其實他對我們很關心，有時候下雨天，媽媽又不在，他是那種大老粗，到學校送東西，那時候我就覺得很丟臉，現在就覺得他對我們真的很好。例如碰到下雨天，學校運動課需要穿布鞋，爸爸就說不行，叫我們要穿雨鞋，我們就說老師會罵，那個時候就覺得很丟臉。他有時候到學校去送雨衣送雨傘，他就這樣子喔，大老遠你就可以聽到「永～萍～！」我們正在上課，然後門就被推開「雨傘啦，拿去啦」，小時候不懂，覺得很丟臉很想鑽進去。……穿衣服的部分，因為媽媽不在，都是爸爸去買。但去菜市場他就會買最便宜的，女生穿起來跟男生一樣，然後也

不知道尺寸大小，買回來就跟男生一樣那種大西裝褲，有時候只好綁一個皮帶或繩子。

相較於列管眷村中可以相互支援的鄰里關係與人際網絡，孫存義必須單打獨鬥地支撐他的家庭生活。列管眷村經常被稱之為一種「沒有血緣的大家庭」，雖然「爸爸們」經常因為工作不在家，但是鄰里之間的「婆婆媽媽們」可以形成一個重要的互助網絡，不論是借醬油、管教小孩或是標會借錢，形式與空間上緊密相連的列管眷戶們，可以提供孫永萍難以想像的各種支援，這是兩者之間家庭生活的主要差異之一。

大陸來臺軍人雖然共同享有戰亂來臺的移民經驗，但其內部也存在許多因為年齡、性別、軍階、教育程度、專長、工作經驗而出現的差異性，成為我們瞭解他們婚姻與家庭生活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面向。以孫存義為例，他從軍之前並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日後是靠著軍中自學才逐漸提高本職學能，此一有限的學習資歷不僅影響了他對待妻子的態度與行為，決定了他對於子女的教育方法，更在其他方面帶來令他晚年充滿無奈的遺憾。

四、職業工作與經濟狀況

民國50年（1961），行政院頒訂《陸海空軍官及士官服役條例》，凡服役年資15年且滿60歲，或是未滿60歲但年資滿20年者，均可支領終身俸或退休金。孫存義考量家庭狀況（照顧小孩）選擇於民國60年（1971，47歲）提前退役，離營官階是陸軍二等士官長，適用職業軍人服役條例。比起早期沒有支領終身俸或退休金的「自謀生活」老兵，孫存義算是幸運很多，由此可見來臺軍人的退除役時間，也是影響他們日後生活條件與機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¹⁷

雖然領有終身俸，但因俸額有限，孫存義退役之後仍積極開闢財源。首先，孫存義開了一間家庭式「○△雜貨店」，店名取自他和妻子名字中的各一個字，每天騎腳踏車去各地批貨，營業規模不大，店裡只有幾個櫃子。孫永萍說，那時候大湳還算是鄉下地區，主要都是附近鄰居來買東西，但鄰居都會賒欠帳款：「我們比較老實，有些鄰居就會比較那種欺負你，我爸又是

17 胡台麗，〈從沙場到街頭：老兵自救運動概述〉，收錄於徐正光、宋文里合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頁163-167。民國50年（1961）之前退役的官士兵沒有終身俸或退休金，人數共計約有14萬3千餘人，一般稱之為「自謀生活」老兵。

老兵，有很多拿了都不給錢。」

孫存義同時也在住家後面的廚房經營一處小賭場，以前部隊中的老戰友都會回來打麻將，他從中賺取一些抽頭金，也算是一種生財之道。爲了招呼賭場生意，孫存義有時無法兼顧雜貨店的生意，經常只好將雜貨店交給小孩子們照顧。下課之後會幫忙顧店的孫永萍表示：

小孩子哪懂得如何顧店，附近鄰居來拿東西就給他賒帳，很多拿了之後都不給錢，我們也不知道最後有沒有還，所以那個店應該是沒有賺錢，可能也是被我們吃倒的吧，因為我們也不懂你知道嗎？然後抽屜裡都有現金，我爸都在後面忙抽頭，沒有時間顧到那裡，小時候學校要捐款的時候，家裡一定不會給，所以我每次就直接拿雜貨店抽屜的錢去捐。

由於住家附近就是民生戲院和中正堂，許多阿兵哥或是一般民衆會來看電影，早年孫存義會幫忙經營「寄車」生意來賺一些錢，就是在戲院和中正堂門口幫忙收寄腳踏車，一次1或2塊錢。¹⁸孫存義沒事的時候還會去撿回收換錢，日常生活省吃儉用。當時，左鄰右舍也流行接做各種家庭代工，做花、勾毛線、繡衣服等，主要是外銷出口。孫永萍說：「我國小就會用縫紉機，還會修縫紉機……小時候還會去撿煤炭，撿完煤炭還去電子廠做電子工，去賺自己的學費。」晚年，孫存義還學會買賣股票，不過投資行爲偏向保守，只有小玩，即使到了出現老年失智症狀的時候，還會不斷問起：「我的陽明股票怎樣我的陽明股票怎樣……。」

在孫存義的努力下，孫永萍自認從小家境小康，比起其他同學，小時候她和幾個妹妹上學就有皮鞋可以穿：「你看那時候本省小孩都是打赤腳，我們家我爸不給我們打赤腳，也不給我們穿夾腳拖，她說女孩子穿夾腳拖，腳會開開很難看，他有時候就是管很多。」此外，孫永萍興奮地表示：「小時候那條街我們是第一個買電視的，鄰居都會來我們家看電視。」

18 目前民生戲院已經拆除，中正堂則是保留下來。中正堂原為陸軍電影院，建於民國53年（1964），主要做為營區官兵、陸光四村家眷、附近民眾的休閒娛樂場所，除了播放電影之外，也可觀賞歌舞表演。1990年代，隨著軍事基地撤出都市地區，國有財產局一度準備將其拆除，拍賣土地。經各方人士奔走爭取之下，中正堂於民國96年（2007）取得歷史建築文資身分並獲得保留，目前已整修完成，轉型成為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湳分館。參見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BE%B7%E4%B8%AD%E6%AD%A3%E5%A0%82>，閱覽日期：2022年3月17日。



圖4：八德中正堂。

資料來源：李廣均攝影，拍攝日期：2022年4月6日。

問到對於父親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事情，孫永萍說：

他非常省，因為要養4個小孩，壓力很大。小時候我們家前面就是夜市，但很少吃外面的食物，幾乎都是由爸爸一手包辦，他做得一手好菜，道地的湖南菜，湖南辣椒還有酒釀，鄰居都會來買，他很厲害。……每天早上 he 會用部隊發的奶粉、麵粉幫我們做早餐，常常做煎餅，再泡個牛奶，有甜的也有鹹的。我小時候不知道爸爸的辛苦，每天吃同樣的早餐覺得很煩，所以有時候到了學校，就會偷偷把裝早餐的袋子丟掉（哽咽）。

歷經戰亂陰影和生活壓力，大多數來臺軍民都會維持一種勤儉克難的生活方式，孫存義也不例外，除了在平常生活之中節流度日，也會積極透過各種方式開拓財源。雖然已經領有終身俸，他除了開設一家規模不大的小雜貨店，還善用軍中人脈就地經營一家小型賭場，縱有遊走法律邊緣的爭議，卻也是面對現實壓力之下的一種生存之道。

雖然兩岸軍事對立依然嚴峻，但自1960年代以來，隨著進口替代工業化和各種經濟干預政策的推動，臺灣的農業生產逐漸被輕工業取代，在「客廳即工廠」的指導原則之下，以勞力密集、出口外銷為導向的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經濟活動快速擴張。在那個物力艱辛的年代，一般民眾多會透過各種

方式積極開拓財源，似乎只要願意努力，就可以找到賺錢的機會，其中以外銷為導向的各式家庭代工就是當時隨處可見的例子，眷村內、外是如此，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之間似乎也沒有太大差別。¹⁹

五、落地成家與建屋置產

對於一位早年隨部隊單身來到臺灣的退伍軍人而言，孫存義如何落地成家，在沒有申請入住列管眷村的情形之下，他如何解決居住需求？除了必須累積一定額度的資金，他是否需要何種人脈或是專業知識？又或是會在何種情境之下購地建屋呢？對此，孫永萍表示，早期因為必須隨部隊四處移防，部隊到了哪裡，爸爸就會在哪裡租房子住，這種游牧生活般的租屋方式持續了好幾年。

後來部隊進駐桃園縣八德鄉大湳地區，又因為妻子離家出走，為了照顧年幼的4個女兒，孫存義決定於民國60年（1971）提前退伍，並夥同幾位老兵各自在軍營附近購地建屋。他花了1萬8千5百元「買」了一塊地（約22坪），找人蓋房子住了下來，這是後來孫永萍長大的地方，可說是一種軍營周邊型自力眷村的雛形。談起這個經驗時，孫永萍激動地表示：

我們就住軍營旁邊，我們就自己買一個房屋（按：土地）。其實那個時候老兵不懂得買賣要契約，所以他們整批那些軍人在附近買了地蓋了房子，可是就只有寫永久那個居住，但他們不懂得過戶，後來我們的房子就被地主的不知道第幾代全部收回去，我們的房子就沒了。我們一些老兵含恨而死，壓根都不懂，然後就被坑。所以我們那個地，就是說一個人幾萬塊（按：補償金）打發，然後我們的房子就拆掉，地也沒有了，但我們都是有繳稅憑證的，繳那個地價稅（按：房屋稅）。但那個上面只有寫永久居住，可是打官司的時候你就沒有那個地契啊，所以判輸，就把所有都收回去，很恨，就拿幾萬塊，地上建物全毀，地也沒了。

原來，當時這些老兵因為不懂土地買賣相關手續與法律程序，以為「買」了一塊地蓋房子，就可以長久住下來。事實上，原契約上只有寫明買方可以「全權使用」，見圖5。但是當初幾位「買」地蓋房的老兵並不知道，

19 楊繼宇，〈眷村的新生臺北市內湖區：內湖新城〉，收於林耀宗編，《護眷心永築夢》（臺北：黎明，2018），頁31。

也沒有進一步完成土地產權移轉手續，始終未取得土地所有權狀，只有自建房屋的建物權狀，就這樣「落地成家」住了下來。後來孫家也發現，當時的「賣方」事實上只是當時在地家族之中十幾位土地持分人之一，在沒有徵得其他土地持分人的同意之下，根本沒有權利也不可能真的將土地轉賣過戶給買地蓋屋的老兵們。孫永萍認為「當初將土地賣給我們的時候，根本就是詐欺！」

1990年代以來，隨著桃園縣經濟發展日趨繁榮，八德鄉人口快速增加。八德地區經過多次都市重劃，原先的農地紛紛搖身一變成爲建地或住宅用地，土地房屋價格飆漲，建商推出的華麗建案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這也讓孫永萍一家人居住所在地的地主後代出現了賣地建樓的想法，聯合向孫存義和當初一起買地蓋房的屋主們（有些是來臺老兵、有些是二手或三手承接老兵房屋的本省籍城鄉移民）提出「民事侵權」官司，要求他們拆屋還地。震驚之餘，原住戶之間組成自救會，經過幾年纏訟，因為「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腳……這種事情連榮民服務處也幫不上忙！」當初「賣地」的人也早已往生，最後住戶們打輸了官司，法院判決他們必須限期拆屋還地。最後，透過在地民代的多次協商，地主一方同意提供每戶約15萬元的拆遷補償費。

孫永萍回想，「這件事情對於爸爸打擊很大，是心中永遠的痛」。房子被拆掉、土地被收回的那一段日子（民國99年，2010），孫存義每天都到現場觀看，不勝唏噓，對他晚年的心情和身體狀況影響很大。孫永萍說，爸爸爲國家奉獻一生，最後卻是這樣的下場，實在令人難過，「落地成家」的幻滅讓他們難以面對。目前那塊地已經被建商收購，改建爲高聳新穎的集合式大樓，每一戶都要千萬元起跳，見圖6。幸運的是在司法纏訟期間，孫存義一家人已在附近買了另外一間房子，不至於流離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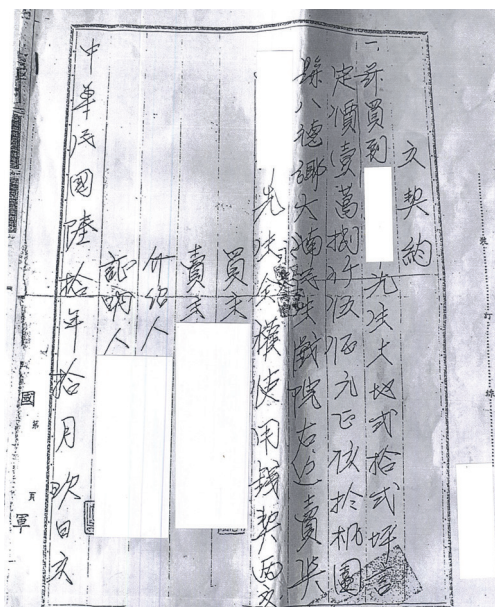


圖5：土地買賣契約書。

資料來源：李廣均攝影，拍攝日期：2022年4月3日。



圖6：孫家原居地巷弄與新建大樓。

資料來源：李廣均攝影，拍攝日期：2022年5月23日。

孫存義的落地經驗和一般列管眷村明顯不同。1970年代末期，經過近30年使用與臺生子女人數的增加，許多早期簡易搭建的列管眷村生活設施日漸不堪使用，改建呼聲日增。雖然全臺886處列管眷村的10萬餘住戶只有居住權，沒有建物土地產權，但享有〈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舊制/行政辦法）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新制/法律）保障的購宅身分與相關權益。

舊制改建適用期間是民國69-85年（1980-1996），改建做法主要是由軍方與各地方政府商談，以眷村土地改建國宅，並以眷村土地價款的69.3%補

助原眷戶購買改建國宅，不足之處則由原眷戶按造價比例分擔。²⁰為了消弭舊制引起的爭議並加快改建速度，民國85年（1996）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成為新制改建的法源依據。《眷改條例》第20條指出，

20 陳積碩，〈康定新村近半原住戶被掃地出門〉，《聯合報》，2001年10月16日，版18。此一做法在各地引起不少爭議，主要因為眷村分散全臺各地，各個眷村所在地價因城鄉位置或都市計劃分區（例如商業區、住宅區、機關用地）各有不同，造成不同眷村住戶負擔比例與金額出現明顯落差。為了入住新屋，有些眷戶需要額外準備自備款，金額從數十萬至數百萬元不等，有些眷戶則一毛錢都不用負擔，可謂眷村改建的「一國多制」，成為各地眷村改建過程中的抗議主因之一。例如，宜蘭縣羅東鎮康定新城是眷村改建的住宅大廈，主要由康定新村與金陵三村的眷戶入住，但由於兩個眷村所在區域不同，標售眷村土地的價款就有很大落差。位屬商業區的金陵三村，標售土地取得的購宅補助金額較多，該村住戶入住1戶30坪的康定新城眷改新屋，只需自備款80萬元左右；位於非商業區的康定新村土地價款較低，眷戶需準備可能高達380萬的自備款或申請房貸。對於月領1萬3千多元退休俸的康定新村住戶而言，未來如何負擔得起每月至少1萬8千元的房貸？

「讓售土地的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則撥入眷村改建基金；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擔。前項原眷戶自行負擔部分，最高以房地總價20%為限，其有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補助」。換言之，相較於舊制為人詬病之城鄉土地價款落差，新制改建以眷改基金做為大水庫，一方面匯合各地眷村土地價款，另一方面挹注各地眷改不足費用，減少眷戶購屋的自備款負擔。

然而，不論舊制或新制改建，影響最大的規定莫屬遺眷與臺生子女的繼承權，以及領取輔助購宅款的選擇權。前述權益的享有是以持有眷村居住憑證者為主，除非全家均已死亡，否則遺眷與子女均享有改建權益。原眷戶、遺眷或是臺生子女可以配售改建房屋，但必須遵守5年內不得交易的閉鎖規定，亦可選擇領取輔助購宅款自遷他處。此一眷改繼承權或領取輔助購宅款的選擇權，堪稱公部門各個職業類別之中條件最佳的眷舍政策。²¹持平而論，縱使存在一些購屋負擔的爭議，列管眷村改建提供的相關權益可以照顧遺眷與臺生子女的居住條件或置產需求，仍優於沒機會入住列管眷村的其他來臺軍人與軍眷，例如孫存義一家人。

六、鄰里生活與族群關係

孫永萍小時候住的地方就在附近軍營的旁邊，是一個以本省人為主的鄰里社區。就原有住戶的省籍組成而言，孫永萍表示，本省人和老兵的占比大約7:3，亦即鄰里之中約有7成是本省人，3成是老兵，老兵的人數大概有7、8位。這些老兵大多是和孫存義一樣的低階軍人，其中有人娶了患有精神病的妻子，也有人遭受騙婚，結婚沒多久太太就跑了，等到老兵死了之後才回來繼承財產。回想起來，孫永萍認為他們和本省人鄰居的關係並沒有太好，就是會打招呼，淡淡的，沒有特別來往。孫永萍回憶兒時居住環境時表示：

其實我們小時候那個地方沒有很好，因為我們老兵就外省人，然後那是本省人的一個區。所以我們小時候是被排擠，然後我媽媽又是原住民，很慘，然後罵你外省仔、番仔，我們小時候在那邊真的很慘。小孩子都還好喔，就是那個大人，他們對誰就很不好，對你也很不好。

21 徐碧華，〈住宅補助對象將以低收入戶為主〉，《聯合報》，1996年10月11日，版1。

孫永萍小時候的居住經驗並不愉快，除了爸爸是外省老兵，加上她的媽媽又是原住民，經常會被附近鄰居叫罵「外省仔」、「番仔」。雖然附近也有一些老兵住在一起，但是他們的家庭狀況都不是很好，有些人娶的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太太，孫永萍小時候每次走過去都會被嚇得馬上跑掉。

孫永萍小時候讀的是大成國小，學校旁邊就是大湍市場，非常熱鬧。班上同學有些人就住在附近的眷村「陸光四村」之中，她談起自己對眷村的印象是，住眷村的這些同學素質都很好，功課也很不錯，她班上的班長就住在陸光四村。有時候放學後，她會跟著同學一起去陸光四村玩，但很少會特別過去。她覺得最大的差別是，眷村中的一些媽媽對小孩子的要求比較多，例如要按時做好功課或是對人要有禮貌等，這些正是她成長過程之中相對缺乏的家庭經驗或文化資本。在探討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時，陳婉琪曾經指出：

本文在這裡要為本分析所發現的外省族群效應提出另一種可能解釋：「眷村效應」。在早年獨特歷史時空下，雞犬相聞的居住模式、歷經戰亂與離鄉背井的相似經驗、置身新環境的相同處境等多重因素的交錯相乘，都有可能使得聚居於眷村當中的外省人口形成比一般情況下更為緊密的社區人際連帶。在這樣的氛圍下，家長所偏好之規範與價值觀可以被強化，緊密社區團體可以形成一種無形監控機制（助於管教子女），來自家庭外部的課業協助也可能帶來實質的幫助……。²²

可以確定的是，前引這種緊密的社區人際連帶或是「眷村效應」並沒有出現在孫永萍從小長大的鄰里之間，成為我們觀察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兩者間的差異，例如子女教育成就、地位取得或社會流動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面向。

正如之前提及，民國38年（1949）前後來臺的大陸軍民有很高的異質性，不是鐵板一塊，生活條件與機會結構主要決定於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軍階、退伍時間、婚姻狀況、工作專長、籍貫人脈、地域差異等。就省籍關係而言，本文嘗試將自力眷村視為一種有待探究的緩衝區，期能超越過去以「竹籬笆」將臺灣社會一分為二的隔離模式，補白我們對於二次戰後臺灣社會人群互動的認識。之前的竹籬笆模式認為，列管眷村是民國38年

22 陳婉琪，〈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臺灣社會學》，期10（2005年12月），頁29。

（1949）來臺移民的主要居住場所，卻也是一個相對自足封閉的生活空間，雖然對內可以凝聚住戶的生活情感與向心力，對外卻是阻礙了省籍之間的互動與瞭解。

相對地，一些研究曾經指出，以來臺老兵爲主的自發性社區或違章建築人口組成較爲多樣，除了退伍軍人、家屬、不具軍人身分的同鄉等，也會逐漸出現許多本省籍的城鄉移民，住戶之間較易發展出跨越省籍界線的友誼或工作關係。²³但是目前本文發現，孫永萍對於小時候鄰里關係的看法並不是非常正面，這可能與她兼具外省人和原住民兩種身分有關，這樣的雙重身分在當時引來的偏見或歧視，會在她心中留下負面印象並不令人意外。另外一個可能原因是世代差異，由於我們沒有機會親自訪問以經營雜貨店爲謀生之道的孫存義或是當時的其他老兵，無法呈現第一代來臺軍人的我群觀點與省籍互動，只能依賴臺生二代的回憶和看法。未來，後續研究值得關注其他類似案例的生活經驗與世代差異。

七、結論

本文以一位桃園縣八德鄉大湳地區自力眷村臺生二代孫永萍爲訪問對象，探究她的成長過程與家庭故事，期能瞭解大陸來臺軍人落地成家的特殊經驗。由於桃園縣八德鄉的列管眷村數量（總計4個列管眷村約928戶）相對有限，數量衆多的來臺軍人在退役離營或是結婚成家之後，必須自行解決居住問題，但因缺乏在地連結或是親族網絡的支援，他們發展出規模不一的自力眷村，開啟融入臺灣社會的各種歷程與生活日常，孫存義的家庭故事即爲一例。

回顧來看，孫存義落地成家的機緣起伏，與臺灣軍事生態的轉變以及經濟發展的社會轉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早年受限兩岸對立的緊張局勢，國民政府必須維持數量龐大的國防預算與軍事人口，孫存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隨著部隊移防來到大湳地區，退役之後在營區附近「買」了一塊地，自己蓋房子住了下來。後來隨著臺灣經濟活動蓬勃起飛，八德鄉成爲

23 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39-40。劉士弘，〈同是天涯淪落人：底層階級、社會運動與認同形塑：博愛里違建區的故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4-6。



圖7：重慶街國有土地上早年老兵自建房舍。

資料來源：李廣均攝影，拍攝日期：2022年5月29日。

桃園市的政經發展腹地，各地城鄉移民蜂擁而來，帶動了大湳地區的熱鬧繁榮，卻也因此啟動都市發展土地重劃，房地齊揚的經濟誘因讓原有農地持分人的後代興起賣地建樓的想法，迫使孫家必須拆屋還地，這是我們認識孫存義的落地軌跡時，必須瞭解的時代背景。

根據孫永萍的回憶，孫存義隨部隊單身來臺，是一位受教經歷相對有限的低階軍人，但他善用軍中人脈，經由同袍介紹找到了結婚對象，夥同幾位老兵一起「買」地建屋，獨自撫養4個幼兒長大成人，甚至開設賭場做為生財之道，雖然晚年因為房地問題抱憾以終，終究是得以在臺灣成家立業，發展出不同於列管眷村的落地軌跡。我們觀察，除了孫存義之外，當時應該還有許多在役未婚、晚婚或是無法順利申請入住列管眷村的來臺軍人，必須自行解決居住問題，他們會在鄰近地區發展出某種同中有異的落地經驗。例如筆者的田野訪談發現，附近重慶街上的一些退伍老兵，早在陸光四村成村之前就在附近國有土地上蓋屋成家（後來轉向國有財產局租用，見圖7），這些都是我們未來瞭解民國38年（1949）來臺軍民落地經驗時，可以持續關注的面向。

整體來看，列管眷村和自力眷村是大陸來臺軍人落地成家時的兩種主要群聚型態，各有不同的人口組成和生活樣貌。比較而言，早年可以申請入住

列管眷村的來臺軍人年齡可能較輕、軍階與學歷較高、夫妻年齡差距較小、子女教育成就較好；入住自力眷村者則是年齡較高、軍階與學歷較低、夫妻年齡差距較大、子女學習成就相對有限。列管眷村住戶組成同質性高、鄰里關係較為緊密熱絡、社區內部凝聚力強、對外關係則是較為封閉自足；相對地，自力眷村住戶組成則是異質性高、人口多元流動開放（多城鄉移民）、鄰里關係較為鬆散平淡，容易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進一步比較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的起源、內涵和轉型，是未來研究可以持續關注的議題。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由於無法親自訪問孫存義本人，本文資料主要是由臺生二代孫永萍提供，其中隱含的一些限制必須審慎以對。例如，對於鄰里生活或是省籍關係的觀察，孫永萍的看法屬於相對負面或保守，但是否真是如此呢？我們好奇，如果有機會親自訪問孫存義或第一代來臺軍人，他們眼中的鄰里社區會是什麼樣的面貌？做為一個雜貨店的經營者，孫存義如何與鄰居互動？鄰里之間的本省人或其他老兵又是否會出現流動情形？再則，1990年代以來，臺灣社會歷經三次政黨輪替，以及至少一次的省籍緊張（例如2004年319槍擊案引發的政治效應），這些經驗都可能影響受訪者對於相關問題的回憶和看法，這是我們解讀本文必須注意的限制。²⁴

24 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提供的修改建議。

徵引書目

專書

黃克仁編，1998，《八德市志》。桃園：八德市公所。

郭冠麟，2005，《從竹籬笆到高樓大廈的故事：國軍眷村發展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期刊論文

王甫昌，1994，〈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期76，頁43-96。

李廣均，2015，〈臺灣「眷村」的歷史形成與社會差異：列管眷村與自力眷村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期57，頁129-172。

李廣均，2018，〈初探桃園縣的列管眷村與外省籍人口（1950-1990）〉，《桃園文獻》，期6，頁71-99。

胡台麗，1989，〈從沙場到街頭：老兵自救運動概述〉，收於徐正光、宋文里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頁157-174。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臺灣社會學》，期10，頁1-40。

張育端、莊翰華、曾宇良，2013，〈非都市丁種建築用地更新之研究－以桃園縣八德市為例〉，《土地問題研究季刊》，期47，頁80-95。

楊繼宇，2018，〈眷村的新生臺北市內湖區：內湖新城〉，收於林耀宗編，《護脊心永築夢》。臺北：黎明，頁30-31。

學位論文

林勝偉，2005，〈政治算術：戰後臺灣的國家統治與人口管理〉。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劉益誠，1997，〈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士弘，2003，〈同是天涯淪落人：底層階級、社會運動與認同形塑：博愛里違建區的故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報紙

王慧瑛、黃瑞典，〈妻外遇生子 老榮民優雅復仇〉，2008年7月18日，《聯合報》，版6。

徐碧華，〈住宅補助對象將以低收入戶為主〉，1996年10月11日，《聯合報》，版1。

陳積碩，〈康定新村近半原住戶被掃地出門〉，2001年10月16日，《聯合報》，版18。

Settling Down: A Family Narrative of One Taiwan- born Mainlander from a Self-Supported Military Commune in Danan, Taoyuan

Li Kuang-chun*, Lin Yun-wei**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identify the gradual “increase/emergence” of Mainlander soldiers as a key contributor to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Bade, Taoyuan in the 1970 and 80s. These veterans clustered mainly in self-supported military communes. Following the family story of Sun Yongping, a Taiwan-born Mainlander from a self-supported military commune in Danan, Bade, Taoyuan,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family’s daily activities, life cycle, marriage custom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occupations, house-building techniques, community lifestyle and ethnic relationships. In this study we will assert that - in addition to registered military communes self-supported communes deserve more attention. Their emer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stands today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imension that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an examination of the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the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before and after 1949.

Keywords: Mainlander soldier, settling down, Bade Township, self-supported military commune, registered military commune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Law and Govern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